



· 人生哲学译丛 ·

敬畏生命

【美】阿诺德·施莱格尔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敬畏生命

Jingwei Shengming

【法】阿尔贝特·史怀泽 著

【德】汉斯·瓦尔特·贝尔 编

陈泽环 译

(沪)新登字 302 号

Schweitzer, Albert
Die Ehrfurcht vor dem Leben
Grundtexte aus 5 Jahrzenten
Hrsg. von Hans Walter Baehr.

5. unveränd. Aufl. Muenchen; Beck, 1988.

本书根据慕尼黑贝克出版社 1988 年德文第 5 版译出

敬畏生命

〔德〕阿尔贝特·史怀泽著

〔德〕汉斯·瓦尔特·贝尔编

陈泽环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168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90,000

1995 年 2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印数 5001—9000

ISBN 7-5580-515-7/40-5/B·39

定价: 5.50 元

质朴的伟大

(代序)

像阿尔伯特·史怀泽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而他又有幸具有极为健壮的体格，这给人的印象就更为深刻了。使史怀泽感到欣慰的是，他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实现符合其天性的一切。健壮的体格要求直接行动，这使他抵制了悲观主义听天由命的倦怠。本来，史怀泽的道德敏感性会使他陷于这种倦怠之中。因此，尽管有当代加于每个敏感的人的种种失望，史怀泽还是成功地保持了她的乐天的、肯定生活的本性。

史怀泽热爱美，这种美不仅仅有艺术的美，它还包括心灵的美；而且，这种美并不只是通过诡辩才得以影响人的。可靠的直觉有助于他保持对生活的确信及和所有生命的直接联系。他在一切领域内都避免了粗暴和冷酷的行为方式。只要史怀泽看到有人被这样对待，他就与这种情况作斗争。例如，人们在他关于巴赫的论著中能明显地觉察到这一点。在《巴赫》中，史怀泽揭露了“内行们”的污染和夸张。正是这些污染和夸张使心爱的大师的杰作失去了光彩，损害了它们给予人的直接和基本的印象。

我觉得，就其最重要的部分而言，兰巴雷内的事业

是对我们在道德上麻木和无心灵的文化传统的摆脱。因为面对这样一种祸害，个别人是无能为力的。

史怀泽没有说教，也不幻想他的行为成为无数人的典范以及对他俩的安慰。他所做的一切，仅仅出于内在的必然性。

无论如何，许多人毕竟有一颗毁坏不了的善良的心，否则他们就从来不会认识到史怀泽质朴的伟大。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编者导言

阿尔伯特·史怀泽的基本原则，他的“敬畏生命”的要求，适用于人类行为能够促进或危害的一切生命领域，从别人的生命，个人对自然的行为直至时代的中心问题：和平、社会发展、文化、科学、环境等等。

在非洲和欧洲，通过创造性的思想劳动，阿尔伯特·史怀泽从神学和哲学的前提出发，论证了这一原则。生命的权利，包括人类和自然生命的权利，它的自由尊严、它的发展、它的价值，是当代多方面的基本课题。阿尔伯特·史怀泽不断深入思考着这些伦理问题，本书收集了他直至1963年的有关著述。这些著述概括了史怀泽的基本见解，即从他在斯特拉斯堡和兰巴雷内写下的关于基督教的博爱和伦理的笔记开始，直至他持续地反对核试验的论证。史怀泽作为神学家、哲学家和医生，他以其罕见的见证力量发挥并身体力行的基本思想，其目标就是与生命休戚与共。他实践了自己的原则并以此教诲人，尽可能尊重和不伤害生命；他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信念，并使人们注意到这一信念。他在手稿中系统地叙述和论证了这一原则。斯特拉斯堡的布道和他的文化哲学著作《文化和伦理》(1923)构成它的开端，本书选入了这两部著作的有关阐述。本书还第一次集中收集了

他在以后几十年中的论述。史怀泽1954年在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讲话、1963年的和平论文，涉及了当今世界保存生命的决定性问题。总之，作为一个伦理命题，“敬畏生命”的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行为始终具有重要意义。

1963年夏，当阿尔伯特·史怀泽在非洲从事活动50年之后，我提出了一个建议，把史怀泽关于敬畏生命的基本论述收集在一本书中，并通过这本书展现他的全部思想和这些思想的形成过程。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进行了此书的编辑。以后，阿尔伯特·史怀泽在兰巴雷内写信给我，由于高龄和那里的工作，他要求我负责本书的最后定稿。当时，在这位89岁的老人的领导下，又开始建造新的病房，他心中充满了对病人的担忧。

那时，阿尔伯特·史怀泽正在冷静地考虑：他的医院在未来如何继续下去。1965年4月2日，即他逝世前几个月，史怀泽在给我的信中再次表达了对出版这本概括其伦理学基本思想的文集的期待。当时，他对他的思想之路充满了信心：“敬畏生命的伦理开始在世界中实现……对你以我的精神所做的一切，我表示感谢。”这样，这本书的历史就可追溯到阿尔伯特·史怀泽的最后三年，追溯到他为人类和和平和子孙后代而进行的斗争。

数十年来，人类给生物带来了未曾预见的问题，而随着阿尔伯特·史怀泽的理论也出现了这种伦理概念，它不仅包括对人类生命的责任，也包括对自然中生命的广泛责任。史怀泽的道德原则和当代的精神发展及其趋

势、希望、重负不可分离。它是当代以及未来的伦理力量，这种力量不会在论战中失落，而能在个人范围内和社会领域中形成坚定的律令。

对待阿尔伯特·史怀泽的原则，我们也要持批判的、客观的看法，应该毫无偏见，并且坚持那种史怀泽在其学术研究中期待的严格性。但是，每种分析都需要这本书的基本论述。因为，只有通过这些论述本身，人们才能了解史怀泽的思想原则之间的相互联系、时代特点、有效性以及全部严肃性。尽管解释敬畏生命原则的争论会过去，但是，这个原则的核心始终是近代伦理学的杰出思想财富之一，始终是它的伟大认识活动之一。论证可能发生变化，新的见解也会形成，但是，这种伦理学所发现的概念，就像其他伦理学原则一样，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思想财富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阿尔伯特·史怀泽实现了这一突破，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它们必须不断地付诸行动。

如阿尔伯特·史怀泽所说，敬畏生命的信念是耶稣基督，耶稣伦理的继续。神学的基础和伦理学——哲学的推论在此密不可分，就像人们根本不可能在孤立的范围内理解思想家阿尔伯特·史怀泽一样。即使从学科语言和门类的角度来看，史怀泽的学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这一切都来自他的主动追求。对于他早年前往赤道非洲帮助受苦人们的决定，史怀泽在其著作和书信中强调这属于那种伟大的、永恒的传统；在他的第四部主要著作《使徒保罗的神秘主义》中，史怀泽写道：在历史变迁中，不断用行动传播耶稣的福音。留在京斯巴赫故居中的遗

著，阿尔伯特·史怀泽关于天国和人类思想的手稿，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他的全部神学和哲学观点；这些手稿于1967年首次公开出版。（阿尔伯特·史怀泽：《天国和基督教》，乌尔利希·诺伊恩施瓦德编辑并作序，摩尔出版社出版，蒂宾根，1967年）史怀泽1919年在斯特拉斯堡关于敬畏生命的两次布道，也是特别重要的文献。多亏乌尔利希·诺伊恩施瓦德经验丰富的编辑工作，我们才得以了解它们。阿尔伯特·史怀泽于一次大战结束后回到故乡，在圣尼古拉教堂的布道中，首次公开宣讲了他的伦理学，并基于他的信仰力量和耶稣基督福音，发展了这种伦理学。

从耶稣福音中获得的信念，贯穿在史怀泽的伦理思想之中，也涉及我们对人类责任范围内的所有生命的行为。敬畏生命告诉我们，对自然中的个别对象，我们始终具有提供伦理帮助的空间和自由。阿尔伯特·史怀泽体现了我们对自然生命的道德义务。我们与生命的交往，不能是无思想的，而应能在被迫毁灭和人的伦理决定的可能自由之间开辟道路。

阿尔伯特·史怀泽所发现和表述的见解，将日益与人的生活领域和日常意愿发生关系。多年来，史怀泽不是匆忙地，而是在长期自我批判的进展中，冷静地检验了自己的观点，由于史怀泽在其活动中实践了他的思想，从而他的见解像任何其他清醒的、严肃的思想世界一样，有权要求对其问题、步骤、陈述以及在现实中建设性的基本力量作出客观评价。

客观、批判地对待史怀泽的思想，正是本书的目的。

对于致力体验事实本身和形成责任意识的读者，但愿他们能发现编者的意图。史怀泽思想的真理内容及其在未来的实现也取决于这种努力。辩护对此则无济于事，即使有人一直这么做。由此，敬畏生命的原则普遍地影响人们的心灵和观念，并谦恭地代表一种更高的意志而诉诸于我们的行为和认识。

本书所汇集的各篇章的次序按写作年月编定，只有第一篇和最后一篇例外，它们的位置由其内容决定。

汉斯·瓦尔特·贝尔

目 录

[1]	中文版代序
[1]	编者导言
[1]	敬畏生命理论的产生及其对我们文化的意义
[19]	敬畏生命
[25]	要求和道路
[43]	文化危机和它的精神原因
[52]	青年时代的回忆
[63]	作为耶稣基督精神生命的伦理
[72]	哲学和动物保护运动
[78]	人类思想发展中的伦理问题
[94]	当今世界的和平问题
[107]	人道
[111]	当今和平之路
[121]	回顾与展望
[139]	阿尔贝特·史怀泽年表
[147]	译者的话

敬畏生命理论的产生及其 对我们文化的意义

1963 年 4 月 21 日于兰巴雷内

(1)

在小时候，我就感到有同情动物的必要。当时，我们的晚祷只为人类祈祷，这使尚未就学的我感到迷惑不解。为此，在母亲与我结束祈祷并互道晚安之后，我暗地里还用自己编的祷词为所有生物祈祷：“亲爱的上帝，请保护和赐福于所有生灵，使它们免遭灾祸并安宁地休息。”

发生在七八岁时的一件事使我难以忘怀。我的同学海因里希·布雷希和我用橡皮筋做了弹弓，它能用来弹小石块。当时是春天，正值耶稣受难期。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他对我说：“来，现在我们到雷帕山打鸟去！”

这一建议使我吃惊，但由于害怕他会嘲笑我，就没敢反对。

我们走到一棵缺枝少叶的树附近，树上鸟儿们正在晨曦中动听地歌唱，毫不畏惧我们。我的同学像狩猎的印地安人一样弯着腰，给弹弓装上小石块并拉紧了它。顺从着他命令式的目光，我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但由

于受到极度的良心谴责，我发誓把小石块射向旁边。

正在这一瞬间，教堂的钟声响了，并回荡在朝霞和鸟儿的歌唱声中。这是教堂大钟召唤信徒的“主鸣”之前半小时的“初鸣”。

对我来说，这是来自天国的声音。我扔下弹弓，惊走了鸟儿。鸟儿们因此免受我同学的弹弓之击，飞回了自己的窝巢。

从此，每当耶稣受难期的钟声在春天的朝霞和树林中回荡时，我总是激动地想到，它曾怎样在我心中宣告了“你不应杀生”的命令。

在我青年时代就存在的动物保护运动的复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终于敢在公众中坚持并宣告：同情动物是真正人道的天然要素，人们不能对此不加理睬。我认为，这是在思想的昏暗中亮起的一盏新的明灯，并越来越亮。

从1893年起，我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在这世纪末期的日子里，我们大学生共同经历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尼采和托尔斯泰各种著作的传播。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他的学业几乎还未结束，就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研究古希腊文化及其精神，而且也从事一般文化问题及其精神的研究。从1880年起，尼采表示反对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传统的欧洲文化。他谴责这种欧洲文化，认为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的软弱和畏缩的精神，它产生要求爱他人的伦理。为了保护这种伦理，它还创立了天国希望的理论。

根据尼采的想法，真正文化的伦理只能是对生活的自豪和勇敢的肯定，“超人”并不受爱的“奴隶道德”的约束，他坚持“强力意志”的主人道德。

尼采以极大的激情阐述了这种关于文化和伦理的本质的新观点，对当时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就在那时，即那个世纪末期的时刻，托尔斯泰（1828～1910）的著作也在公众中流行。在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这位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代表了一种不同于日尔曼的世界观。托尔斯泰肯定伦理的文化。他认为伦理的文化是他在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中获得的深刻真理。通过他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也使我们了解：他是如何认识真正人道和质朴虔诚的。

我们 19 世纪末的年轻人，就这样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打交道。

在这种状况中，我曾有过极大的失望。我曾期待宗教和哲学能共同有力地反对和驳斥尼采。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也许它们已表示过反对尼采。可是我认为，宗教和哲学没能也没有尝试在尼采对它们挑战的深度上阐明伦理的文化。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本人在世纪末期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是否真正具有不可缺少的伦理动能。这促使我研究文化和伦理问题。在 19 世纪后半叶，这个问题受到哲学界的普遍重视。我发现，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哲学文献根本就不认为文化和伦理是一个问题；相反，它们把文化和伦理作为既成的精神成就而接受下

来。

我自己则不能摆脱这种印象：人们认为永恒的伦理并没有向人类和社会提出重大的要求，它是“处于休息状态”的伦理。

从而，在 19 世纪末，当人们为了确认和评价这一世纪的成就而回顾和考察各个领域时，流行的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乐观主义。人们似乎普遍相信，我们不仅在发明和知识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且在精神和伦理领域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和再也不会失去的高度。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精神生活似乎不仅没有超过过去的时代，而且还依赖于前人的某些成就；更有甚者，其中有些遗产经过我们的手而逐渐消失了。

我清醒地意识到，在有些场合我只能确认：当非人道的思想公诸舆论时，它们不是遭到拒绝和指责，而是被简单地接受。所谓“现实政策”受到欢迎。尼采的“强力意志”开始发挥它的危险作用。在一些领域流行的“现实政策”为它开辟了道路。我认为，一种精神和心灵的疲乏似乎已经侵袭了为其工作和成就而自豪的当代人。

从而，我越来越注重探讨 18 世纪后期的文化和伦理。

对我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精神状况，我决定进行深入研究并作批判性的考察，这一著作的标题应是《文化和伦理》。我觉得，我们正处于一个精神衰落的时代；因此，我试图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我们模仿者”。

1900 年夏季，我在柏林大学学习。在著名的古希腊语言、文化研究者恩斯特·库齐乌斯遗孀的家中，我经

常遇见富有吸引力的柏林学者。一天下午，一些“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在出席了科学院会议之后，来到那里喝咖啡。他们继续讨论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突然，其中一位先生总结性地说道：“我们大家都只是模仿者。”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并不是唯一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模仿者时代”的人。

20 世纪初，我花时间研读近几十年来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并考察它们就我们对生物的行为说了些什么。

这些著作的绝大部分都认为这是次要的，只有少数几本探讨了这个问题。

其中有些作者表示了对动物的同情，但他们为此甚至要请人原谅，因为动物似乎和我们人并不处于同一等级。人们几乎不能在任何一本书中看到：人们应该给予同情动物以更多的重视。

但是，我确信，人们在哲学—伦理学中也应该给予善待动物的要求以一个位置。我认为，诸如帮助动物保护运动，从理论上论证他们的行动等等，对此似乎都是很适宜的。

1913 年，在结束医学专业的学习之后，为在兰巴雷内办一个诊所（1872 年，美洲长老会的传教协会在那里建立了教区），我与我妻子一起前往法属赤道非洲。通过在这个地区活动的阿尔萨斯传教士，我知道那里迫切需要一个医生。当时，人们正在同在赤道非洲肆虐的昏睡病作斗争。

为了能够继续从事“我们模仿者”这个课题的研究，我在行李中也带上了足够的哲学书籍。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此我在法属赤道非洲陷于险恶的处境。作为阿尔萨斯人，我的妻子和我具有德国国籍。虽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来到法国殖民地，并在这里开办一个诊所。但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由于我们是德国人，就必然被当作俘虏来对待。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人们就告诉我们，也许应把自己看作被拘留者。我们可以留在家里，但必须放弃与白人或黑人的任何交往。我们的住宅前出现了看守者，包括1名黑人低级军官和4名黑人士兵。

由于我被禁止在诊所工作，从而又有了时间来处理我多年思考的、由于战争的爆发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即“文化和伦理”的问题。

从现在起，战争作为文化衰落的现象而肆虐着，而我不再考虑把“我们模仿者”作为这一著作的标题了。

为什么只批判文化？为什么满足于把我们作为模仿者来分析？时代要求建设性的工作。

我开始探寻伦理文化软弱无力的原因，它如何由战争的爆发而表现出来？直到11月底，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由于当地的白人和黑人都抱怨，没有什么理由剥夺当地唯一的医生的自由，我们的拘留被解除了。当然，我在巴黎政府内的朋友也为公正地对待我出了力。

在我重新开始诊所工作之后，我发现还有时间继续研究伦理文化变得无力的问题。

从那时起，我认为有必要探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种持续的、深刻的和有活力的伦理文化是怎样产生